

文化价值是文化传播的关键

张西平

[提 要] 文化价值是文化传播的核心,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研究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外传史的研究, 它同样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重新认识的过程。如果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 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外播的文化意义, 首先要树立文化自觉。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基本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展开论述。

[关键词] 文化价值; 文化传播; 文化自觉; 中华文化

[作者简介]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汉学》主编, 国际儒联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DOI:10.19377/j.cnki.43-1531/g0.2019.02.013

值这个核心的问题上来。

一 文化价值是核心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研究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外传史的研究, 它同样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重新认识的思想过程。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 使我们开始有了新的视角, 新的视域, 我们开始以世界的眼光来透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当我们了解“中学西传史”后, 我们会为这四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在西方命运的跌宕起伏而心潮澎湃。晚清以后的百年, 中国“以西为师”, 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以批判为主要导向的, 无论是向英美学习, 还是向苏俄学习大体都是如此。我们很少考虑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价值和意义, 很少考虑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贡献, 很少知道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西译后对西方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与贡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 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我们继续拥抱世界, 接纳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 告别“以西为师”的时代开始了。要实现这样一种文化自觉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一个从事中国文化外传的学者不应该对自己的文化采取鄙视的态度, 如果这样做学问, 这种学问就是伪学问。任何学问都有价值立场, 如果没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所包含的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 我们的研究就仅仅是一堆没有灵魂的知识。因此, 我们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价

二 重新确立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历史研究告诉我们, 中国经典的西译从晚明时期已经开始, 那时翻译的主体是来华的传教士。晚清以来,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西方的炮舰政策打断了中国社会缓慢的自然成长, 中国被纳入西方控制的世界体系之中。从此, “以西为师”成为中国文化百年的主调, 百年欧风美雨, 西方文化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语言、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宏大的历史叙事来看, 尽管这是无奈的选择, 但也客观促使了中国文化新的再生和发展, 虽然是被动的。

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介绍西方文化, 由此, 翻译西学成为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职责。虽然在民国时有《天下》杂志横空出世, 于危难中传播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有外文局力挽狂澜, 在西方文化的围剿中, 为新中国辩护。但从总体上看, 中译外在中国百年的文化格局中是无足轻重的。

如果中国的国家实力仍是排在世界的 100 位之后, 国家仍处在积弱积贫之中, 我们可能很难考虑中国文化的外传问题, 因为亟须解决的是如何渡过国家和文化的危机问题。但今天, 当中国已经走到世

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文化的外传,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外译就自然成为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我们承认这样的现实,今天这个世界的规则大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他们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开创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因为西方文化只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在文化问题上世界不能完全由西方主导。由此,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西译及其研究就成为一个关乎重建世界文化格局的重要问题。

如果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外播的文化意义,首先就要有文化自觉。这是我们从事这一研究的起点。

三 文化自觉的三层含义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的一个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那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不就是要要求文化自觉么?”^①

1. 文化自觉的三层含义

费孝通先生这里讲的文化自觉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文化自觉的提出是对全球化的回应。这是说费孝通先生是在什么文化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开启的全球化浪潮,打破了地域文化的界限,各种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遇,西方文化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迅速向全球发展。此时“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域,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相互角逐。”^②按照萨义德的看法,全球化是那些大资本的公司推动的,是西方的帝国主义推动的,因此“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哪一种是单一的、单纯的。”^③在西方强势的文化面前,与其相遇的其他文

化自然会有反抗、抵御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从改革开放到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中国的知识界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从最初的拥抱全球化逐步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是完全的西方化,看到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所做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我们会看到‘全球化’背后所隐含的特殊价值论述。这种假‘普遍’之名的特殊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进程,我们一定要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而是说,我们要在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当中考虑连续性的问题,要寻找一个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当代表述。”^④

张旭东的这段话应是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原因的最好解释,说明费孝通先生这一概念的提出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讨论,它是对全球化在中国展开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全球化所引起的文化问题的一个回答。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也是核心问题,是对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的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是给我们提出在当今世界上做一个中国人的理由何在,意义何在?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持续到今天价值何在?费孝通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告别了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我们历史文化凝结成的文化传统生活有没有价值?如何处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的现代化文化,这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文化认同当然是一个当代的概念,但如果从长时段、大历史来看,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一直是存在的。佛教传入中国后,面对这种外来文化,儒家士大夫们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对佛教文化吸收的过程,在佛和儒之间当时有一个身

①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3).

②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2.

③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2.

④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

份认同的问题。韩愈出于复兴儒学的需要,写下了《京道》《原性》《与孟尚书书》《论谏迎佛骨》等一系列的文章,后因他上书反对迎佛骨,激怒皇帝而被贬,从而写下了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但历史的发展和韩愈的预料相反,佛教文化最终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到晚明时儒释道三教合一已经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证明: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性特征,一元多体是中华文化的最好表达。中华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次是基督教文化的传入。

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就是,对文化发展的展望。费孝通先生和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 1884—1942)一样对西方殖民主义充满了反感。因为,西方文化在其扩张的过程中把大量的多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摧毁了,把异于西方的文化的多样文化同质化了,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日益失去文化的多样性。谈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时,费孝通先生说:“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这个结论很重要,是他从非洲殖民地上看出来的。换句话说,殖民主义不可能解决文化共存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①

2. 文化自觉的学术意义

这样费孝通先生便提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文化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②这个原则就是在自身文化认同条件下的多元文化观。显然,这是我们展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研究的文化立场和学术基本出发点。如果说从晚清起中华文化自然发展历程被打断后,西方文化以强势进入中国,但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虽然充满苦难与艰辛,但中华文化并未中断,变迁的中华文化在断裂中保持着连续性。

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当代文化的合法性的认同,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如果没有这个学术研究的基本文化立场,展开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研究的文化意义就会全部失去,从而使这个研究变成一堆死去的知识,研究者的文化立场完全没有了。每一个从事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研究者都应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形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化以它独有的魅力感动过许多西方的哲人,中国思想和文化曾是西方长期仰慕的对象。十九世纪后,随着西方的崛起,中国开始日益被妖魔化,在文化的较量中,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所承载的思想和价值似乎完全失去了意义,中国文化开始被分裂,一个是躺在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文化,一个是充满矛盾的中国当代文化。

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被列为国策。如何走出去?文化传播的规律和二十世纪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走出去”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只有在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价值基础上,阐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才会被别人所接受,东海、西海乃一海,天下同心、同理。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有着共同的理想。这样,阐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价值,揭示其在中国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这些文化价值的普遍性意义,就成为我们展开中国文化外播研究的基本文化立场,也是我们今天常讲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一种没有文化价值的文化是永远不会打动人的,一种没有文化意义的文化是永远不会传播开来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史,它更是一种思想的交流,是一种中国古代文化价值的传播。所以,从学理上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意义,才能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化四百年来在西方传播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一言以蔽之,一种文化能否被传播,被接受,被理解,核心是它的价值。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考察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是做好文化传播的首要条件,但了解自身文化的基本内容与特点,熟悉自身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有的放矢做好文化传播的基本要求。

①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J].读书,1998(11).

②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J].读书,1998(11).

四 中华传统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中国在上世界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所谓的“文明古国”指的是创造出人类最早文化形态的国家。一般来讲“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和古印度。本文所研究的主题是代表古代文明中国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

华夏先民因生息于黄河流域，周围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指的是地处中原的华夏民族。中华的“中”，意谓华夏民族居四方之中；中华的“华”意谓华夏民族是具有文化的民族。章太炎先生曾说过：“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①

中华传统文化发生在东亚大陆，它西隔高山，北接大漠，东临大海，因而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两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相比于其他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在基本未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下，它独立完成了自身文化的发生和创建，确立了自己的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此后，它才逐渐与其他文化相接触，虽然外来文化对其也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 and 态势已经在之前基本确立了。

第二，由于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外来异族的冲击，从而中断自己发展的进程。“长城内外是故乡”，汉民族和长城外草原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过程，期间的冲突不仅没有中断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反而成为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壮大过程。而其他原生性文化，如古埃及文化、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文化从此中断；而古巴比伦文化和古印度文化经过多次的外族入侵，其原生文化形态已经被深深地叠压在文明的底层，与现代文化形态隔绝，使其仅仅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而再无现实的文化意义。在世界各个原生文明中，唯有中华文化没有发生文化的中断，历经数千年而持续不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仅有的现象。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大约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如同水向

低处奔流一样，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日本、朝鲜乃至后来独立的越南，都是以中华文化为其源泉，大规模地受容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符合他们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在十九世纪以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汉字中华文化圈。由此，成为与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用收藏在巴黎的一个敦煌的卷子中的内容来表达，这是一位来中国礼偈的梵僧写的一首名为《礼五台山偈一百二十字》的诗：

长安地阔杳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
长安帝德谁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
汉家法度礼将深，四方则取慕华钦。
文章浩浩如流水，白马驮经远自临。
故来发意寻远求，谁为明君不暂留。
将身岂惮千山路，学法宁辞度百秋。
何期此地却还回，泪下沾衣不觉斑。
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所有历史都走向基督，而且来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现是历史的轴心。”这种将基督教历史观作为人类历史观的“历史轴心”说，显然是站在欧洲基督教的文化立场来讲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它并不能概括整个人类的历史。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对人类历史作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为“普罗米修斯的时代”，即语言产生、工具和火的使用的时代；二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同时在中国、古印度、古巴基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基；第四阶段，从公元前200年至今，其中从十七世纪开始进入科学和技术的时代。他侧重分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并提出“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概念，用以匡正黑格尔的基督教历史观。

他说：“要是历史有一个轴心的话，我们必须依靠经验在世俗历史中寻找，把它看成是一种对所有人都重要的情况，包括基督徒在内。它必须给西方人、亚洲人以及一切人带来信念……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生活中的

^①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N].民报,1907年7月第15期.

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及无数其他哲人的时代。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Upanishad)和佛陀的时代;如在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基斯坦,以利亚(Elijah)、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第二以赛亚(Deutero-Isaiah)等先知们奋起。在希腊,诞生了荷马(Homer)、巴门尼德(Parmenides)、赫拉克里克(Heraclitus)、柏拉图(Plato)、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这些名字仅仅是为了说明这个时代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个世纪之内单独的也差不多同时的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①

雅思贝尔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的一个总结,“轴心时代”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个起点和基础。也如中国文学家闻一多所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数千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从这一开端时期就定型了。”^②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上的奇葩,它是唯一一支存活下来的人类远古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文化不仅明显领先于周边的文化,同时也领先于其他文化圈,特别是在唐代,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中国是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中心,正如著名科学史专家贝纳指出的,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③

五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华文化是一个延绵不绝、高潮迭起的发展系统,在这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中,它最基本的特征是

什么呢?

1. 大一统的国家民族理念。钱穆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特征时首先就指出,“国家”与“民族”的融合是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出发点。他说:“我们讲述中国文化史,首先应注意两件事。第一是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第二件事由第一件事引申而来。正因为中国文化由一民族或由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脉相承’,‘传统不辍’。只见展扩的分数多,而转变的分数少。”^④

作为地名的“中国”二字,目前所见,最早出现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周原出土的“何尊”。“何尊”上的铭文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这些百姓。”以后,“中国”的概念也被作为文明和文化的意义使用,而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公子成的话最为明确,公子成说:“中国者,盖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用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由此,‘中国’、‘中华’与‘夷狄’之别,也渐由地理区域之别,渐变成为文化与文明之别。”^⑤

从民族来说,经过长期的接触融合,中华民族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从上古到秦汉,从以华夏族为主干的中原文化直自满人入关到现代,它不断地吸收、融合和扩大与更新,从而形成中华民族这条民族生命之河。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融合,在趋同汉文化的同时,仍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犹如一个大家庭的兄弟一样。“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

① 雅思贝尔斯.智慧之路[M]//田汝抗,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9.雅思贝尔斯的“轴心说”显然比黑格尔的观点大大进步了,开始有了多元文化的视角,但从世界文化史的真实历史来看,仍有不足。因为希腊文化并非原生性文化,它是受到东方文化(埃及文化和两河流域文化)影响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点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已经做了很好的论证。人类四大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黄河文明、印度河文明才是世界文明之根。中国文明早在“轴心时代”“之前已经有了夏商周的丰厚文明积累”。“轴心时代”“这样的观念容易使人忘记人类文明之根是亚非文明,希腊文明只是次生文明”。

②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M]//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③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序言[M].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④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1.

⑤ 王学典.答基辛格问[N].中华读书报,2013-04-03(06).

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①

从国家来说,从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秦始皇修长城,原本是为了防御草原民族的入侵,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却是:长城内外是故乡。元朝和清朝所代表的草原民族政权的建立不仅没有中断中华文化的历史,反而使其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新的血液,使中华帝国的版图在一定的地理单元中形成更为统一的国家。“正因为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

所以,只有从这样两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如钱穆所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系。‘民族融合’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成为民族融合。中国文化便在此两大纲领下,逐步演进。”^②

西方国家一些人从自己国家的历史出发,特别是仅从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近代单一民族国家形成历史来理解中国,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不知道中国人这样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的国家形态认同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独有的文化历史背景中的。从而做出许多在中国一般民众看来可笑和无知的事情,如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2. 持久趋同的文化生命力。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持久性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所独有的。上面我们提到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其文明未遭到其他文明侵入的重要原因。从世界历史看,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文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腓尼基地区文化、克里克岛上的爱琴文化以及迈锡尼、古波斯、古希腊等诸多的古代文化系统,都是建立在比较单一的水系和平原上,缺少地理上对其文化保护的自然屏障,从而一旦外族文化入侵,文明就会发生断裂。显赫一时的古罗马文化就是因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而开始瓦解的。

大一统的国家民族理念与现实也是中华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从殷周到清末,中国的政治未曾发生过外在的断裂,它是通过一种不断的“内部调

整”的方式达到了一种超稳定的完整架构的。

中华文化的这种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佛教文化的传入并最终中国化,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一带,它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后结果是产生了它的最大的派别——禅宗,这个完全本土化的佛教。同时,它又催生了中国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宋明理学,外来的佛教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顽强地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们来到中国的开封后,这个被称为“挑筋教”的外来宗教最终消融在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早在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这种文化的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屡遭劫难而未分裂的重要原因,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力量。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汤因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曾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在世界文化史上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历史上罕见的持久趋同的文化历史意识。

3. 宗法伦理的社会制度。中华先民栖息在东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也和中国各派思想家的倡导有着直接的关系,墨家求“尚同”,儒家求“大同”,汉儒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天人三策》,载《汉书·董仲舒传》)。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3.

亚大陆这个辽阔的原野上,他们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白居易这首诗很好地描述了农村的生活。农业生产的特点使血缘宗法制度成为氏族社会的形态,在氏族社会解体时,以血缘关系为其基本形态的宗法制度延续了下来。这点和希腊社会以海上贸易为主从而造成了血缘关系的解体有很大的不同。农业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特点,造成中国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特点——“家国同构”,即家庭和国家在组织结构上的共同性:父家长制。由此衍生出中国的宗法伦理。中国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血缘关系占三,而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也可以从血缘中推衍出来。这样,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都是从家庭伦理中演绎出来。孝亲成为中国道德的本体,由孝亲推及为忠君,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可移于官。”(出自《孝经·广扬名》)如梁启超所说:“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治国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在。”^①

宗法血缘制度的社会结构对中华民族的心理、伦理、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使伦理学成为中国文化之本,三纲五常伦理观念成为中华文化之核心。这样的社会制度和伦理特点成为中国在农业文

明时期社会稳定、文明发展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不断反思和批判这种血缘宗法的社会制度和以孝亲父权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当作为制度的儒学解体,以家庭为单元的农业生产逐步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进程开启,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建立以后,如何消除封建家长制度的消极影响,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伦理体系,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时,在现代化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又如何继承中华伦理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使其转化成中国现代社会伦理的资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的大会上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②

这为我们传播中国文化指明了方向。

^①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2).